

戊戌維新運動史論集

戊戌维新运动史论集



胡 绳 武 主 编
湖 南 人 民 出 版 社

戊戌维新运动史论集

胡绳武 主编

责任编辑：邓潭洲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湘潭地区印刷厂印刷

1983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268,000 印张：12.625 印数：1—4,300

统一书号：11105·216 定价：1.60 元

序

胡绳武

戊戌维新运动是在甲午战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形势下，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发动的一场爱国救亡运动。同时，它又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的思想解放运动。它对近代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思想的发展，产生过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建国以来，我国史学界对这一历史课题的研究与有关史料的整理和出版，都取得了不小的成绩。

但是，无庸讳言，过去由于“左”的思想影响和其他各种原因的干扰，我们对戊戌维新运动史及其代表人物的研究，无论在厘清历史事实还是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方面，还是很不够的。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随着科学的春天的来临，史学界对戊戌维新运动史及其有关人物的研究也开始活跃起来，并发表了不少论文。有的文章发出重新评价戊戌维新运动的呼吁，有的对戊戌维新是改良主义运动这一传统说法提出不同意见，有的认为光绪是爱国皇帝而不是卖国皇帝，有的将戊戌变法与日本明治维新进行比较研究，力图做出合乎实际的结论。这种学术上的民主，无疑会促进我国学术的繁荣与发展。

近几年来，我们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部分同志也就有

关戊戌维新运动史的一些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写出了一些论文。承湖南人民出版社的好意，愿将这些文章选编出版，我们感到十分高兴。我能担任本书的主编，这对我说，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

这部《戊戌维新运动史论集》共收了十篇文章。其中，戴逸同志的《戊戌维新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潮》，是一篇探讨戊戌维新运动思想渊源的文章，因此把它放在本书的开端。文章指出：我国早在戊戌变法以前，已有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开始引进西方的自然科学和资产阶级的政治社会理论，并揭露、批判了中国封建制度的弊端，提出了各种富强自救的方案。其先驱者可以上溯到龚自珍、魏源，后经冯桂芬、王韬、薛福成、马建忠、何启、郑观应、陈炽、陈虬等人继续努力，形成了日益宏大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潮。文章介绍和评述了在半个多世纪内，这一启蒙思潮怎样逐步地发展壮大，它所包含的“君民共主”和“商战”说等思想内容，探讨这一思潮的形成、特点、局限性以及它和戊戌维新运动的继承关系。它有助于我们系统地了解戊戌维新运动的思想根源。其余的九篇文章，就其内容看，大体上可分成三组，每组三篇。

李文海同志的《戊戌维新运动时期的学会组织》和吴廷嘉同志的《论戊戌思潮的兴起及其过程》、《论戊戌思潮的历史作用》等三篇文章是属于综论性的，因此将它们编为一组。戊戌维新运动时期出现的各种学会，是当时的新鲜事物。它们的出现，促进了维新运动的开展，对辛亥革命准备时期的立宪团体和革命团体是一个必经的发展阶段。同时，对后来学术、文化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也有相当的影响。但是，我们过去尚缺乏对这

一问题的专门研究。李文海同志的这篇文章有助于读者了解当时维新派在全国范围内所开展的组织活动和宣传活动的情况，了解这场运动能成为具有全国规模的有一定群众性的政治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的原因，以及它后来为什么会产生深远的影响。维新变法思想是推动戊戌维新运动的思想力量。过去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主要是放在对维新派代表人物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严复等人变法思想的研究上，而很少把它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来进行考察。吴廷嘉同志的两篇文章则把戊戌思潮的兴起、发展和衰落的过程及其历史作用进行了综合的论述。文章搜集了较丰富的资料，论证了戊戌思潮对近代中国教育、文化和学术事业发展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并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这些无疑会有助于对这个问题的进一步研究。

改革与反改革的斗争是戊戌维新运动期间维新派与顽固守旧势力之间斗争的焦点。李文海同志的《戊戌维新时期改革与反改革的斗争》，集中地讨论了这个问题。王俊义同志的《论谭嗣同的改革献身精神》和林克光同志的《康有为教育改革思想及实践》，均涉及这一问题，因此就把它编成一组。过去的论著在论述维新派与顽固守旧势力环绕着改革问题进行斗争时，往往强调维新派软弱性的一面，而忽视他们具有既勇敢又坚决的斗争精神的一面。李文海同志的文章在论及维新派在斗争中的表现时，则指出了维新派在改革与反改革斗争的过程中具有既软弱又坚决、既怯懦又英勇的特点，并认为这种特点正是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维新派这个政治派别的特定阶级性格的表现。文章认为当维新派清楚地认识到自己与守旧势力之间力量的悬殊，也清楚地意识到改革事业的艰难险恶时，他们仍然知

难而进，英勇搏战，这种立志改革的精神是极为可贵的。这种看法，应该说比较合乎实际，将有助于我们对维新派与戊戌维新运动的历史作用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康有为的教育改革思想和他在教育改革方面的实践，过去也较少有人进行专题研究，对谭嗣同的研究过去虽进行得较多，但集中论述谭嗣同在维新运动中的地位和他的献身精神的历史意义的文章则不多。林、王二位同志的文章，将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康有为、谭嗣同这两个维新派代表人物的研究。

《论集》最后一组的文章，与前面的两组有所不同，它们是属于考证性质的。这组文章的特色是运用了大量的档案材料，结合其他史籍，对有关戊戌变法的重要史料和戊戌政变的重大史实进行考辨。其中，孔祥吉同志的《〈戊戌奏稿〉的改纂及其原因》，对一向被人们认作研究康有为戊戌时期政治主张的第一手史料《戊戌奏稿》一书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考证。它指出，当该书于1911年出版时，康有为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曾将所辑录的奏议与进呈书序进行了改纂，因此该书不能真实地反映康有为戊戌时期的政治主张。孔祥吉同志另一篇文章《康有为戊戌年变法奏议考订》则考订出尚未为人们所知的康有为的一些奏稿（包括康代杨深秀、宋伯鲁等人所拟的奏章）。房德邻同志的《戊戌政变史实考辨》一文则对有关政变日期、政变原因、袁世凯告密、谭嗣同被捕日期、光绪帝赐康有为密诏等五个有关政变的重要史实，进行了考证。文章指出：政变发生的直接原因并不是通常所说的袁世凯的告密，而是政变前夕杨崇伊向慈禧太后所上的“请即日训政”的密折，慈禧太后得到袁的告密已在政变发生之后，光绪帝在政变前夕已向慈禧太后妥协，

他并未谕袁世凯“弼后杀禄”，也未密诏康有为“迅速出外”，“设法相救”，康有为后来所公布的二道密诏，出自康的伪作。这一组考证文章，揭示了康有为对《戊戌奏稿》的篡改，考证出了康有为在戊戌年的历次奏议，对有关戊戌政变的重要史实提出了不同于传统的看法，为戊戌维新运动史及有关历史人物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这些都将有助于解决由于缺乏足够的证据长期以来没有最后定论的一些问题，促进研究工作的继续深入。

值得指出的是：这部《论集》所收的十篇论文，其中吴廷嘉、孔祥吉、房德邻三位同志所写的五篇文章，是他们在硕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由于这些论文资料比较丰富，特别是发掘使用了一些新材料，提出了一些新论点，所以在举行论文答辩时曾得到好评。这些同志学术上的成长，反映了我们史学界正在新秀辈出，这确是令人非常欣慰的事情。

这部《论集》的出版，可能有助于对戊戌维新运动的进一步研究。但是，由于对许多问题都是初步研究，其中一定会有某些不确和谬误之处。希望同志们不吝批评指正。

再者，本书所收论文，只有孔祥吉同志的《戊戌奏稿的篡改及其原因》曾于去年分别在《人民日报》、《晋阳学刊》刊载，此次又经作者补充修订。其余各篇，均系首次发表。

最后，我们表示十分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湖南人民出版社的邓潭洲同志。他审阅了全部书稿，核对了引文，对有些文稿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并作了文字上的润色。这部《论集》能够出版，是与他的辛勤劳动分不开的。

1983年4月于北京

目 录

戊戌维新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潮……………戴 逸 (1)

戊戌维新运动时期的学会组织……………李文海 (48)

论戊戌思潮的兴起及其过程……………吴廷嘉 (79)

论戊戌思潮的历史作用……………吴廷嘉 (117)

戊戌维新时期改革与反改革的斗争……………李文海 (156)

康有为教育改革思想及实践……………林克光 (182)

论谭嗣同的改革献身精神……………王俊义 (213)

戊戌政变史实考辨……………房德邻 (235)

《戊戌奏稿》的改纂及其原因……………孔祥吉 (284)

康有为戊戌年变法奏议考订……………孔祥吉 (307)

戊戌维新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潮

戴 逸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的思想界随之而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和封建主义思想、帝国主义奴化思想相对立，产生了一股进步的思想潮流，这就是中国近代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潮。

资产阶级启蒙思潮是中国近代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产物。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压迫阻碍着中国的进步，中国人民展开了不屈不挠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这时候，地主和商人出身的一些知识分子抱着救国救民的愿望，揭露和抨击腐败的封建制度，向西方资本主义学习先进的制度和思想，企图改变中国落后挨打的地位，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他们成为中国资产阶级最早的代言人。但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在十九世纪的下半叶，还处于早期发展阶段，十分微弱，它仿佛是被压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巨大顽石之下的一束柔嫩的小草，很难长得茂盛。因此，中国资本主义在思想上的反映也不能不表现出这个特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提出过许多进步的、爱国的主张，对于开创风气，启迪民智，促进社会改革起了重大的作用。但他们的主张中有不少糟粕和不切实际的幻想，在某些重要问题上未能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划清界限。

他们不相信群众的革命斗争，而把自己主张的实现寄托于帝国主义的同情和封建统治者的自行改革。当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变法主张触犯了反动派的根本利益，反动势力一加反扑时，软弱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们就弃甲曳兵，束手就戮。历史证明：资产阶级启蒙思潮虽然是中国历史的必然产物，对社会的进步起过重大的作用，但它不可能拯救中国，资本主义的道路在中国是走不通的。

—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潮的先驱可以追溯到龚自珍和魏源。他们是鸦片战争前后地主阶级中的进步人士，是封建中国和西方资本主义开始接触时的先进思想家。他们批判了封建旧制度的种种腐朽、不合理现象，在主张抵抗西方资本主义侵略的同时，又主张吸取西方的文明。他们的思想对后继的进步思想家有很重要的影响。

龚自珍（1792—1841）号定庵，浙江仁和（今杭州）人。生长于“累代仕宦，簪纓文史”的书香门第，父亲龚丽正系进士，官至苏松太兵备道，外祖父段玉裁是著名的经学家。龚自珍从事社会活动，主要在乾嘉之后，当时封建社会已千孔百疮，走向没落，“自京师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者。四民之首，奔走下贱，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奚暇问年岁？”^①。龚自珍逝世前的一年，已响起了鸦

^①《西城置行省议》，见《龚自珍全集》第106页。

片战争的隆隆炮声。他生活的五十年，正是中国封建社会解体，开始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代。他的思想，反映了历史转变关头的时代特征。

龚自珍才华早露，早年所作诗文，“风发云逝，大有不可一世之概”^①。他长期随父亲游宦于苏、浙、皖各地，耳闻目睹官场的黑暗腐败，广泛接触“田夫、野老、骑卒”等下层群众，对社会情况有较深的了解。他博学多才，“于经通公羊春秋，于史长西北輿地。其文以六书小学为入门，以周秦诸子、吉金乐石为崖郭，以朝章国故、世情民隐为质干。晚尤好西方之书，自谓造深微云”^②。他的作品淋漓尽致地揭露封建末世的矛盾，尖锐而辛辣地抨击专制主义的种种弊端，因此遭到统治者的忌恨。他三十八岁成进士，此后十年，任内阁中书和宗人府主事等小官，浮沉宦海，郁郁不得志。1839年，他辞官南下讲学。1841年以暴疾死于江苏丹阳。

龚自珍指出：当时的社会是“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的“衰世”。在社会经济方面，土地兼并十分严重，大官僚大地主依仗权势，霸占大量土地，聚敛大批钱财，出现了“贫相轧，富相耀，贫者陷，富者安，贫者日愈倾，富者日愈壅”的情况。经济上的贫富不均，势必导致政治上的动荡不安，“至极不祥之气，郁于天地之间。郁之久，乃必发为兵燹，为疫疠，生民嗷类，靡有孑遗。人畜悲痛，鬼神思变置”^③，变革的风暴就快要到来了。

① 吴昌绶：《定庵先生年谱》。

② 《定庵文叙录》，见《魏源集》上册，第239页。

③ 《平均篇》，见《龚自珍全集》第78页。

龚自珍在指出社会贫富不均的同时，又揭露了封建专制政治的专横和腐败。他总结历代封建专制王朝盛衰的教训，“昔者霸天下之氏，称祖之庙，其力强，其力武，其聪明上，其财多，未尝不仇天下之士，去人之廉，以快号令，去人之耻，以崇其身，一人为刚，万夫为柔”，在这样的专制统治之下，“积百年之力，以震荡摧锄天下之廉耻，既殄，既弥，既夷”^①，风气遭破坏，人才被摧残，士大夫养成阿谀奉承，趋福避凶的圆滑习气，看着长官的脸色行事，“历览近代之士，自其敷奏之日，始进之年，而耻已存者寡矣！官益久，则气愈熯；望愈崇，则谄愈固；地益近，则媚亦益工”^②。官场充塞着这班昏庸卑劣之徒，只知道谋一己的升官发财、封妻荫子，置国家安危、民生疾苦于不顾。他又抨击官场论资排辈的用人制度，“累日以为劳，计岁以为阶，”一个人考中翰林，授庶吉士，而“自庶吉士至尚书，大抵须三十年或三十五年，至大学士又十年而弱。……夫自三十进身，以至于为宰辅，为一品大臣，其齿发固已老矣，精神固已惫矣！”^③这样的人虽然有些经验，但锐气尽丧，瞻前顾后，“因阅历而审顾，因审顾而退憊，因退憊而尸玩，任久而恋其籍，年高而顾其子孙，僂然终日，不肯自请去”。^④龚自珍把这种人比做衙门口的石狮子，“具形相向坐者数百年”，资格确实是最老的了，却是官僚机构的无用摆设罢了。

龚自珍还批判了封建末世的思想界：万马齐喑，一潭死水。知识分子只会读时文，作八股，脱离实际，志气消磨，所学无

①《古史钩沉论一》，见《龚自珍全集》第20页。

②《明良论二》，同上书，第30页。

③④《明良论三》，同上书，第33页。

用。他认为这是封建专制主义进行思想控制的结果。“当彼其世也，而才士与才民出，则百不才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戮之非刀、非锯、非水火，文亦戮之，名亦戮之，声音笑貌亦戮之。……徒戮其心，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①。最后，人才被摧残殆尽，朝廷上没有贤明勇武的将相，社会上没有优秀杰出的士农工商，连强盗、小偷也都是低能儿，“起视其世，乱亦竟不远矣”^②。所以，龚自珍发出了震撼人心的呼喊：“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瘖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③。他期待着风举雷发，人才辈出，能使中华大地重新呈现蓬蓬勃勃的生机。

在揭露和批判现实社会的同时，龚自珍竭力鼓吹变法改革。他说：“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④。他寄希望于统治者的一旦醒悟，能自己进行自上而下的变革，“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⑤。他认为：一个朝代的盛衰兴亡，最重要的原因是土地、财产是否分配均衡，贫富悬殊是王朝败亡的根源，“浮不足之数相去愈远，则亡愈速。去稍近，治亦稍速。千万载治乱兴亡之数，直以是券矣”^⑥。因此，他主张调整和重新分配土地财产，解决贫富不均问题，缓和阶级矛

①②《乙丙之际著议第九》，见《龚自珍全集》第6页。

③《己亥杂诗》，同上书，第521页。

④《上大学士书》，同上书，第319页。

⑤《乙丙之际著议第七》，同上书，第6页。

⑥《平均篇》，同上书，第78页。

盾。他描绘了一个未来社会的蓝图，希望把租佃关系纳入宗法家族关系的框框中去，把人们按照血缘关系分成大宗、小宗、群宗和闲民四个等级，按此授予土地，形成一个“宗能收族、族能敬宗”的和睦社会。这些自然都是实现不了的幻想。值得注意的是：龚自珍虽然主张重新分配土地、财产，但并非绝对的平均，他希望在宗法关系之下允许自由竞争，积累私有财产。他说：“上古不讳私，百亩之主，必子其子”，“有能以尺土出谷者，以为尺土主；有能以倍尺、若十尺、百尺出谷者，以为倍尺、十尺、百尺主”^①。他主张人尽其才，各人按照耕种能力拥有土地。他反对封建卫道士的“遏欲”、“去私”。这些主张，和他的前辈戴震的思想颇有共同之处。

龚自珍还针对专制君主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主张加重大臣和地方的权力，改变督抚大臣不能“行一谋，专一事”的不正常情况；他又力主废除八股，用人不限资格，广泛地网罗人才，做到“夹袋搜罗海内空”；他很关心边防海防，主张移民西北，加强防务，设置行省；又提出要警惕西方资本主义“环伺澳门，以窥禹服”。当林则徐被任为钦差大臣，赴广州查禁鸦片时，龚自珍写了《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支持禁烟抗英，替林则徐出谋划策。

龚自珍的一些具体改革主张是不可能实现的空想。当历史进程还没有发展到足以提供解决任务的条件和手段时，人们是不可能制订出切实可行的行动方案的。龚自珍思想的可贵之处在于：敏锐地体察并勇敢地揭露了社会矛盾，对旧事物进行抨

^①《农宗》，见《龚自珍全集》第49页。

击讽刺，对新事物热情地期待和赞颂。他的诗歌、文章，是中国封建主义走向崩溃的一曲挽歌，对以后的进步知识分子影响甚大。梁启超说：“自珍性跌宕，不检细行，颇似法之卢骚^①。喜为要眇之思。其文辞俶诡连犴，当时之人勿善也，而自珍益以此自喜。往往引公羊义讥切时政，诋排专制……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②。

魏源（1794—1857）字默深，湖南邵阳人。他和龚自珍都服膺今文经学，倡导经世致用。两人的思想相近，友谊很深，世称之为“龚魏”。魏源出生在小地主的家庭中，少年时代曾广泛接触下层社会。二十一岁随父亲到北京，从刘逢禄学公羊之学，结交了林则徐、龚自珍、姚莹等，共同研究学问，议论时政。二十九岁中举后，会试屡次落第。后在大官僚贺长龄、陶澍处当幕友，为他们编书撰文，研究经济政治，协助他们整顿和改革盐政、漕运、河工。鸦片战争期间，他应邀参加两江总督裕谦的幕府，在浙江前线参加抗击英国侵略的战斗。1845年，他五十二岁，才考中进士，任江苏东台、兴化的知县，又升高邮知州。在清朝政府对付太平天国革命战争的过程中，他“迟误驿报，劾罢职”^③。晚年潜心佛学，“不与人事，唯手订生平著述，终日静坐”^④。1857年在杭州病逝。

魏源的著述很丰富，既有阐发“微言大义”的今文经学著作《诗古微》、《书古微》、《公羊春秋古微》、《董子春秋

①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②③ 魏源：《邵阳魏府君事略》。

发微》等，又有一般地谈论哲学、政治的《默觚》以及探讨财政、经济、军事的《筹河篇》、《筹漕篇》、《筹鹺篇》、《军贮篇》，代人编纂的《皇朝经世文编》，还有历史地理方面的《元史新编》和对山脉水道的考证。他的著作中，最重要、最具有时代特色的是他在鸦片战争以后编著的《圣武记》和《海国图志》，这两部著作反映了他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爱国思想，并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向西方学习的进步主张。

1840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从此，中国封建社会发生了重大转折，向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走去，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空前地激化。如何对待外国侵略者？如何使国家摆脱危机？每个进步的知识分子不能不进行思考和探求。魏源是当时知识界了解世界形势最清楚，反抗外国侵略最坚决，所提救国主张最切实的人。他认为鸦片战争的失败，主要是政治腐败所造成的，清朝“承平恬嬉，不知修攘为何事。破一岛，一省震；骚一省，各省震，抱头鼠窜者胆裂之不暇，冯河暴虎者虚骄而无实”^①。他把“人心之寐”和“人才之虚”视为社会的两个病根。所谓“寐”就是糊涂，对世界情势懵懂无知，对当前危机麻木不仁；所谓“虚”就是空洞，夸夸其谈，不切实际，并无真知灼见。他看透了官场和知识界的严重问题，提出“去伪、去饰、去畏难、去养痼、去营窟”以克服“寐”。又提出“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艾三年而蓄之，网临渊而结之，毋冯河，毋画饼”^②，以克服“虚”。这位热诚的爱

①《道光洋艘征抚记上》，见《魏源集》，上册，第187页。

②《海国图志叙》，同上书，第208页。